

# 西欧何以成功

——读范·赞登《通往工业革命的漫长道路：  
全球视野下的欧洲经济，1000—1800年》

李伯重

范·赞登(Jan Luiten van Zanden)教授是国际著名的经济史学家。他1981年毕业于荷兰自由大学(the Free University, Amsterdam),1985在瓦格宁根农业大学(Agricultural University of Wageningen)获得博士学位。此后先在伊拉斯姆斯大学(Erasmus University, Rotterdam)和自由大学任教,1992年移帐乌德勒支大学(University of Utrecht),直至今日。他自大学毕业后一直从事经济史研究,至今已有30余年,在欧洲经济史研究方面成果斐然,先后出版了*The Strictures of Inheritance: The Dutch Economy in the Nineteenth Century*、*Dutch GNP and its Components, 1800 - 1913*等专著(合著)以及*Rich and Poor before the Industrial Revolution: a comparison between Java and the Netherlands at the beginning of the 19th century*、*On the Efficiency of Markets for Agricultural Products*、*Rice Prices and Capital Markets in 19th Century Java*等具有重要影响的论文。由于其成就,他于1997年当选为荷兰皇家科学院院士,2003年荣获荷兰全国最高科研奖——荷兰科学研究组织颁发的斯宾诺莎奖。他还于2009—2012年间担任国际经济史学会会长。

范·赞登在经济史研究领域做出了多方面的贡献,其中最著者,是他创造性地使用国民帐户核算系统(SNA)方法对历史上的GDP进行的研究。在西方学界,研究近代以前的GDP并不始于他。麦迪森的《世界经济千年史》就是一部综合了众多学者在这方面研究成果的著作,他对中国历史上的GDP的研究成果《中国经济的长期表现,公元960—2030年》(*Chinese Economic Performance in the Long Run, 960 - 2030*)也是开拓性的成果。但是就深入的区域研究而言,做得最出色的当数范·赞登及其领导的研究团队。他们使用国民帐户核算系统的方法,对近代早期荷兰的GDP进行了开拓性的和深入的研究。<sup>①</sup>他们的研究代表了国际学界在此领域中的最新的进展,为其他国家的学者研究近代早期的GDP提供了重要借鉴。

在取得这些成就的同时,范·赞登并没有把自己的眼光限制在这个非常专门的经济史研究领域中。他时时关注更大的历史进程,力图更全面地去理解历史和解释历史。

经济史不是历史的全部。熊彼特早已指出:经济史“只是通史的一部分,只是为了说明而把它从其余的部分分离出来”<sup>②</sup>。同时,研究经济史的方法也是多种多样的。索洛(Robert Solow)对西方学者中一些只是简单地使用经济学方法来研究经济史的做法提出了强烈的批评:当代经济学脱离历史和实际,埋头制造模型;而当代经济史也象经济学那样,“同样讲整合,同样讲回归,同样用时间变量代替思考”,而不是从社会制度、文化习俗和心态上给经济学提供更广阔的视野。因此“经济学没有从经济史那里学到什么,经济史从经济学那里得到的和被经济学损害的一样多”。经济史学家可以

[作者简介] 李伯重,香港科技大学人文学部教授。

① 其主要成果见 Jan Luiten van Zanden, *Taking the Measure of the Early Modern Economy: Historical national accounts for Holland in 1510/14*; Jan-Pieter Smits, Edwin Holings & Jan van Zanden, *Dutch GNP and its Components, 1800 - 1913*, 等等。

② [美]熊彼特著,何畏等译:《经济发展理论》,北京:商务印书馆1991年版,第65页。

利用经济学家提供的工具,但不要回敬经济学家“同样的一碗粥”。<sup>①</sup>除此之外,全面和深入地了解经济史还面临一个更大的问题。以往在西方中心论的支配下,西方经济史学界把研究重点放在西欧经济的历史变化上。而对西欧经济史在近代早期从传统向近代转变的研究,又主要以英国经验为基础。这种以英国经验为基础的经济转型的“西欧模式”,被认为具有放之四海而皆准的普遍意义。近年来,这种公认的普遍意义受到越来越多的质疑与批评。因此如何正确对待“西欧经验”,成为晚近兴起的“全球史”所关注的主要问题之一。

面对上述挑战,经济史学者应当怎么办呢?要改变上面这些情况,谈何容易!多年前,巴勒克拉夫(Geoffrey Barraclough)受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委托,为该组织出版的《社会科学和人文科学研究主要趋势》撰写了历史学卷,<sup>②</sup>对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以后世界各国史学发展状况进行总结。在该书结语“当前的趋势和问题”中,他写道:“近十五至二十年来历史科学的进步是惊人的事实”,但是“根据记载,近来出版的百分之九十的历史著作,无论从研究方法和研究对象,还是从概念体系来说,完全在沿袭着传统。像老牌发达国家的某些工业部门一样,历史学只满足于依靠继承下来的资本,继续使用陈旧的机器”。而造成这种状况的最重要的原因,则在于历史学家“根深蒂固的心理障碍”,即“历史学家不会心甘情愿地放弃他们的积习并且对他们工作的基本原理进行重新思考”。<sup>③</sup>因此,不是每位学者都能正视这些挑战并采取积极的措施,去解决这些挑战所提出的问题的。而在能够这样做的学者中,范·赞登是一位佼佼者。

面对上述挑战,范·赞登调整了自己的研究重点,研究地域从西欧(特别是荷兰)转向了全球,研究的对象从经济扩大到政治、文化、社会,而研究方法也采用了经济学、社会学、政治学、历史学等多学科的方法。他在这方面做出的努力所产生的成果之一,就是本书——《通往工业革命的漫长道路:全球视野下的欧洲经济,1000—1800》。

本书英文版 *The Long Road to the Industrial Revolution: The European Economy in a Global Perspective, 1000 - 1800* 于2009年由 Brill 出版社推出后,迅速引起学界的重视。之所以如此,一个原因是范·赞登(以下简称本书作者)选择了工业革命的起因这样一个重大课题,作为本书研究的对象。工业革命被视为“把人类历史分开的分水岭”。<sup>④</sup>经过这个伟大变革,人类告别了以往传统的农业社会,进入新的工业社会。由于其在世界历史上具有这种“头等的重要性”,<sup>⑤</sup>因此对工业化的研究在世界历史研究中也理所当然地占有特殊地位。

为什么会发生工业革命?学界对这个问题的研究,从工业革命发生起就已开始。在较早的研究中,工业革命被视为一个18世纪突然发生的历史现象。但到20世纪后期,此看法已逐渐被大多数经济史学家抛弃。现在比较普遍的观点是:工业革命并非一个局限于某一时期的现象,而是一种持续的现象,<sup>⑥</sup>正如诺斯所说:“工业革命并非与我们有时所认为的那种过去根本决裂;恰恰相反,它是以往一系列渐进性变化的积累”。<sup>⑦</sup>换言之,作为一个重大的历史现象,工业革命绝不可能突然出现。在欧洲,按照奇波拉的看法,工业革命乃是18世纪以前700年来发生的历史变化的最后阶段。<sup>⑧</sup>而

① Robert M. Solow: “Economic History and Economics”, *The American Economic Review*, Vol. 75, No. 2.

② 后来以《当代史学主要趋势》为题,由杨豫先生译为中文,于1987年由上海译文出版社出版。

③ 巴勒克拉夫:《当代史学主要趋势》(中译本),第327、330—332页。

④ Douglas North, *Structure and Change in Economic History*, New York: W. W. Norton & Company, 1981, p. 158.

⑤ [美]L. S. 斯塔夫里阿诺斯著,吴象婴等译:《全球通史(1500年以后的世界)》,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99年版,第276页。

⑥ [意]卡洛·奇波拉主编,徐璇等译:《欧洲经济史》第4卷上册《工业社会的兴起》,北京:商务印书馆1989年版,第1页。

⑦ Douglas North, *Structure and Change in Economic History*, New York: W. W. Norton & Company, 1981, p. 162.

⑧ Carlo M. Cipolla, *Before the Industrial Revolution: European Society and Economy, 1000 - 1700*, New York & London: Routledge, 1993, p. xiii.

依照其他许多学者的看法,在这7个世纪中,欧洲已出现过一次甚至多次“工业革命”。<sup>①</sup>因此可以说在18世纪的工业革命以前很久,欧洲的经济已出现了重要的变化,在此基础上,18世纪的工业革命才有可能发生。

相对而言,在世界历史上,只有英国的工业革命主要是在“自己完成的经济循环”(笛福语)的基础上发生的,从而带有某种“自立性”的色彩。<sup>②</sup>其他国家(或地区)的工业革命,或多或少地受到先行者(特别是英国)的影响,甚至是法、德等国也不例外。<sup>③</sup>至于更晚出现工业革命的国家或地区,受先行者的影响就更为巨大和明显。由于英国的这种特殊地位,其经验对于研究工业革命的起因当然具有无可比拟的意义。在过去两百多年中,学者们从近代早期英国的经济、政治、社会、文化、意识形态等方面,以及世界的变化(特别是殖民地的开发)等方面,找出了众多工业革命赖以出现的必要因素,并根据这些因素对工业革命的起因作出了多种解释。这些解释都认为:只有英国以及西欧(还有西欧的衍生物——北美)具备这些因素,因此工业革命必然发生在英国,之后只有西欧和北美可以迅速跟进,从而出现工业革命,而其他地区则否。

然而,以往研究中得出的各种结论,仍然不能够完美地解释工业革命何以发生,以及工业革命为什么在西欧发生。之所以如此,主要有两方面的原因。

首先,以往工业革命研究中发现了各种导致工业革命的因素,然而彼此之间的关系到底如何?还是一个需要继续深入研究的问题。多年前,未来学家托夫勒在当时风靡一时的《第三次浪潮》一书中说:“任何对工业革命原因的探索都是徒劳的,因为它没有一个简单的和主要的原因。技术本身并不是推动历史的力量。意识形态或价值观念本身也不是。阶级斗争也不是。历史也不仅仅是生态变化、人口趋势统计、或者交通工具发明创造的记录。单单用经济因素也不能说明这个或其他任何历史事件。这里没有超乎相互依赖的可变因素之上的其他‘独立的不变因素’。这里只有相互联结的可变因素,其复杂性深不可测”。<sup>④</sup>事实上,这些“相互联结的可变因素”是怎么变化和怎样相互联结的,对工业革命起源的研究来说,可能与发现这些因素同样重要。

其次,以往对工业革命起因的研究,对象仅只限于英国和西欧。这是有道理的,因为工业革命确实起源于英国以及西欧。然而,正如巴勒克拉夫早就呼吁的那样,西方史学必须“重新定向”,必须尝试“采用更加广阔的世界史观点,跳出欧洲去,跳出西方去,将视线投射到所有的地区与所有的时代”。他强调:“史学家的观点愈富有世界性,愈能摆脱民族或地区的偏见,就愈接近获得有效于当代的历史观念”。<sup>⑤</sup>晚近霍布森(John M Hobson)更强调:“这种常见但却富有欺骗性的欧洲中心论,从各个方面来说都是错误的。至少可以说,东西方从公元500年开始就通过全球化一直联系在一起。……东方的边缘化导致了一种高度的缄默,因为它掩盖了三个重要的事实。首先,东方在约公元500年后开拓了其自身的重大经济发展;其次,东方在公元500年后积极创造并维持着全球经济;第三,也是最重要的,东方通过开创和向欧洲传播许多先进的‘资源组合’(如技术、制度和思想),对西方的崛起做出了积极和重要的贡献。因此,我们需要恢复东方经济活力以及东方在西方崛起过程

① 例如费尔南·布罗代尔认为西欧出现过三次“工业革命”:第一次发生于11—13世纪,最主要的地方是意大利;第二次发生于16—17世纪,主要在英国;第三次则发生于18世纪中叶以后,主要地点仍在英国。参阅[法]布罗代尔著,顾良等译《15—18世纪的物质文明、经济和资本主义》第3卷,北京:三联书店1993年版,第630—644页。

② 见[日]大河内晓南《英国的工业革命》,中译本收于周宪文编《西洋经济史论集》,台北:台湾银行1984年印行。

③ 在研究工业革命发生的特定条件时,法国经济史学家克劳德·福伦说:“法国不是这一革命的原发地,按照一个普遍发生于西欧的过程,工业革命在很大程度上是由英国输入并向英国仿效的结果”。德国经济史学家克纳特·博查特也说:“不列颠的经济发展对德国的经济发展产生了深刻的影响”。前引奇波拉主编《欧洲经济史》第4卷上册第1章《1700—1914年法国的工业革命》(福伦执笔)和第2章《1700—1914年德国的工业革命》(博查特执笔),第2、66页。

④ [美]托夫勒著,朱志火等译:《第三次浪潮》,北京:三联书店1983年版,第170页。

⑤ 巴勒克拉夫:《当代史学主要趋势》(中译本),第158页。

中所发挥重要作用的历史”。<sup>①</sup> 近年来兴起的加州学派更提出了一系列新观点,迫使学界从全球历史的角度出发,去重新审视欧洲的发展轨迹,将这一地区的表现与欧亚大陆其它地区加以比较,并导致了如何为这种比较提供基础支撑的问题。对于工业革命起因的研究,也应当如此。

本书作者正是从以上两个方面入手,来重新探讨工业革命的起因。他在本书开始,就开宗明义地指出本书研究工业革命“深层次”(或者说最根本)的起因,旨在说明:第一,在欧洲,中世纪晚期和近代早期阶段是通向“腾飞”的工业革命的一条“漫长的跑道”。他指出:中世纪在许多方面都比1500—1800年间的三个世纪富有活力。这个观点解决了有关18世纪晚期工业革命起源的三种不同争论,即关于“大分流”(Great Divergence)的争论、人力资本形成在“革命”的准备阶段所起的作用的争论,以及制度在经济发展中的作用的争论。其次,以往经济学家已经开始研究这一历史过程中的主要突破,提出了各种不同的理论,以解释1800年左右发生的增长模式的激烈变革。但迄今为止,经济史学家们并未找到足够的证据来支持发生于1800年前几个世纪中的人口结构变化。但在本书中,作者认为,这样一种人口结构的变化确实发生了。第三,工业革命的一个重要特征是出现了经济腾飞,而新制度经济学的理论和方法对分析和理解长期经济绩效是很有帮助的。经济史学家可以将此方法加以发展,用于研究工业革命。

基于以上认识,本书作者从新的角度对近代早期西欧的经济史进行了深入探讨,并且把西欧与欧洲之外的地区进行详尽比较,思考这些地区的制度和人力资本形成所反映的内容,并尝试讨论它们在近代早期阶段的长期发展过程。在解决这些问题的过程中,他采用了新近获得的数据,对长期发展进行量化分析。

本书另一大特点是走出欧洲,将西欧的发展置于世界历史视野之中,以观察西欧究竟是否真正与其它地区有所不同;如果确实不同,那么在何时才出现明显差异。作者认为要回答这些重要问题,首先要对制度效率、人力资本形成以及经济绩效的各种指标体系进行详尽的定量比较,以弄清制度与人力资本形成之间、以及人力资本形成与经济增长之间的相互关系。作者认为:自中世纪晚期以来,西欧在制度、人力资本形成以及经济绩效三个方面都具有突出的表现,特别是北海地区(即英国和低地国家)在三方面的表现最为突出。然而,北海地区经济在中世纪晚期和近代早期阶段所取得的成功,都深深根植于中世纪鼎盛时期形成的制度之中。

本书还有一大亮点,即知识经济的问题。作者认为:知识经济能够创造出足够的“实用性”知识,进而引发近代经济增长。但是,哪些长期过程和制度有助于人力资本的形成和思想的积累,以使西欧确实能够经历这种向知识经济,进而向近代经济增长的转变呢?过去的研究并不多。在本书中,作者追溯这段历史过程,指出:从中世纪开始,特别是公元900年至1300年,知识积累和人力资本形成出现了重要变化。在这段时期,欧洲发生了一场遍及全欧的经济扩张。但是到了中世纪晚期(1300—1600),北海地区仍保持着快速发展的同时,其他地区却经历了经济增长减缓。他把这个现象称为欧洲经济的“小分流”(Little Divergence),并通过对婚姻模式、家庭对资本和劳动力市场的参与程度的研究,来解释这种“小分流”。在此基础上,他考察了1400—1800年间知识经济在西欧(特别是北海地区)的兴起。知识经济的发展推动了该地区独有的人力资本积累过程和知识积累过程,并构成了北海地区在1800年前的几个世纪中具有的强大经济表现的历史背景。随后,他将这段历史过程延续到了18世纪晚期西欧的“双革命”,<sup>②</sup>并继续对制度(如公民身份制度)和经济发展之间的相互作用进行分析,以精确地确定近代经济增长始于何时,以及伴随着经济结构转变的人均收入

① [英]约翰·霍布森著,孙建党译:《西方文明的东方起源》,济南:山东画报出版社2009年版。

② “双革命”(dual revolution)一词,系霍布斯鲍姆(Eric Hobsbawm)在《革命的年代:1789—1848》(王章辉等译,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一书中提出,指1789年的法国大革命和同时期发生的英国工业革命。这两场革命改变了世界,并且还在继续使整个世界发生变革。

持续增长的进程始于何时。同时,基于他对荷兰共和国进行的案例分析,研究近代早期的市民与国家之间的关系,重构中世纪制度下的村社“公民”与1789年后形成的现代公民之间的联系。最后,将西欧的发展与欧亚大陆其它地区在近代早期的发展情况加以比较,以确定西方的崛起究竟有多么“特殊”。具体而言,步骤如下:

1. 工业革命不是突然发生的,而是经济增长和结构转型过程的结果,这一转型开始于17世纪初期的几十年,并且发生在北海地区的其他部分,特别是在尼德兰(荷兰)。

2. 近代经济增长的第一阶段的背后的驱动力是16世纪出现的世界市场。荷兰和英格兰这两个国家能够迅速扩张是因为他们设法赢得了逐渐扩大的国际服务(贸易、运输和金融)的份额,以及扩大了它们在关键出口工业中的份额。

3. 荷兰和英格兰能够做到这一点,是因为拥有高效的制度,这个制度可以产生低利率、大量熟练和非熟练的劳动力供给以及形成高水平的人力资本。这两个国家仿效中世纪的城邦国家,都经历了“军事—财政”国家阶段。他们使用国家的武力扩大商业精英的利益。这些新型的国家出现在荷兰独立战争和英国内战期间,是在专制王权和他们的精英之间的冲突中产生的。

4. 工业革命是内在激励、经济结构、知识积累和人力资本形成之间互动的产物。内在激励,比如对节约稀缺的、昂贵的劳动力的渴望,刺激了经济结构的转变。西欧在1800年之前的数个世纪中实用知识不断累积。这种累积与人力资本的增长有关。该增长开始于中世纪,并且由于制度改善(它导致了低利率)、新技术(印刷)、新教主义(这个和引起新发展的原因同样有效)和快速增长的城市(特别是在北海地区)对熟练劳动力的需求的增长,而在中世纪后期加速。实际上,人力资本形成的水平(由技能溢价和/或书籍产量衡量)和经济绩效之间有可能建立紧密的联系,这就使得我们可以成功地“预测”19世纪“大分流”期间各国的表现。

5. 为了解释这些出现的新制度只是在北海地区产生的原因(或者说,为什么只有在这个地区,中世纪的制度革命才产生出合理的结果),本书分析了这一地区潜在的人口结构转型,特别是中世纪晚期欧洲婚姻模式的出现。这个模式是人口类型对新的市场环境的适应过程,反过来又引起了人们对劳动力市场和资本市场的参与的提高以及高水平的人力资本(包括男女在内)的形成。这个人力资本形成成为了西欧这部分的典型特征。

6. 欧洲婚姻模式和中世纪晚期在北海地区出现的市场经济的突破,共同建立在中世纪中期出现的制度之上。在西欧的其他地方,发生在950—1300年间的制度和经济的蓬勃发展在近代早期没有能持续下去,欧洲中部和南部的经济在1500—1800年大部分处于停滞状态甚至下降。这和中世纪盛期发生的泛欧洲的经济增长过程形成鲜明对比。这个欧洲内部的“小分流”,与欧洲南部和中部的停滞和制度的失败有关,例如专制主义的出现和欧洲中部一些地区农奴制度的复归,专制主义压制了中世纪出现的更加“平衡”的制度。

7. 本书在关于制度和制度改变的分析中,进行了许多关于制度效率的量化比较。利率、技能溢价、市场参与水平以及市场融合度都被用来衡量制度在规范市场交换和保护财产权方面的效率。结论是从中世纪以来,西欧,特别是北海地区的制度相对来说更加有效,特别是“纵向”制度(“vertical” institutions)比欧亚大陆其他部分的制度更有效。只有明朝晚期和清朝时期的中国以及德川时期的日本才拥有可以和西欧的那些制度相媲美的制度,特别是横向制度(horizontal institutions)。开始于17世纪和18世纪英国的近代经济增长过程的基础,就是出现在欧洲中世纪晚期的那些相对高效的制度。

8. 西欧高效的“纵向”制度的关键特征,是他们保护无权者以对抗那些掌权的人。这种“权力平衡”(balance of power)又出于下列原因:1)关于“法治”(rule of law)的“正确的”法律思想;2)把书面词汇作为“真理”的最终来源;3)借助于“自下而上”的制度建构过程来解决集体行动的问题,其中社

团法人(universtates)起了关键作用。其结果,权利变成了一种遵守宪法规定的(constitutionalized)权利,即权利要受到书面语言的界定和约束,权利也变得可协商(negotiable),即要潜在地服从参与各方的协商,从而这样的权利也是可分割的,可分开的(partiable)。这是一个完全不同的关于权利的概念,与我們在这个时期(以及在古代)的大多数的非欧洲社会发现的权利都不同,在其他地方,权利原则上是统一的(unified)、自上而下的(top-down)和整体的(monolithic)。

9. 这些“自下而上”的制度的最重要之处,是使西欧的发展路径不同于东亚国家,东亚在明朝政府和德川政府统治下也出现了市场经济,但那是两国政府自上而下实施自由放任政策(laissez faire)的结果。这可能有助于解释为什么在西欧这样一个包含很多差异很大的政治经济体的地区,其“纵向”制度是更加有效的,即这种制度导致了非常低的利率,反之,东方的“横向”制度可能比西方的更加优越。这个结论的重要性被这样一个事实所强调,即通过近期的研究显示“纵向”制度比“横向”制度更有助于解释长期的经济表现。

通过细致和深入的研究,本书得出了一些非常重要的结论。例如,作者考察了那些在西欧中世纪盛期大多已开始出现的制度,包括法治、合作团体(如行会)、欧洲婚姻模式和公民权的概念等,分析了这些制度的相对效率,看它们是怎样降低交易成本和扩大市场交换的。通过观察反应制度绩效的相对价格,证实相对高效的制度是怎样影响在西欧发生的人力资本形成和知识积累过程的。<sup>①</sup>然后将人力资本形成和经济绩效联系起来,显示拥有高水平的人力资本形成的国家和地区都经历了经济的相对较快的增长。通过比较北海地区和欧洲大陆其他地方的情况,发现了这一联系。由此来比较西欧和欧亚大陆其他地方的情况时,也就可以更好地解释19世纪初的“大分流”。

西欧大部分地区的长期经济变化曲线的特点,是中世纪的突然扩张,随后是长时间的稳定期,即便不是“高水平”的经济停滞,这一路径也与同一时期的中国或者中东的经济发展道路没有什么显著的区别。但是只有北海地区在近代早期保持了持续的扩展,这也使得西欧和欧亚大陆的其他地方有了不同之处,因此,欧洲“小分流”最终导致了世界的“大分流”。

在本书中,作者特别把中国和日本作为观察西欧经济变化的对照。他对各种不同的制度效率指标和人力资本形成指标进行了分析,显示出日本和中国与欧亚大陆其他地方不同。从中国清朝和日本德川时期开始,有大量的证据显示两国都有繁荣的书籍贸易,同时书籍的需求量也大幅增加,尽管从人均数量上来看还赶不上西欧。同时,也有大量的证据显示,中日都有逐渐复杂的市场交换和高水平的市场融合;在中国还有相对较低的技能溢价(可能在日本也是如此);而且,资本市场的进步也让利率迅速降低。因此在中国和日本,可以发现同样的相关关系,即制度效率和高水平的人力资本形成之间的关系。在19世纪,日本的高效制度和高水平人力资本使得它可以迎接西方带来的“开放”挑战,并且还能迅速复制西方的技术和一些有活力的制度。在中国,结果非常不成功。可能关键的不同点是,日本在明治维新之后运用国家来进行关键的改革,而中国在19世纪的时候没有起到相似的作用。作者特别指出:尽管他强调从中世纪以来的西欧独特的发展可以作为其长期成功的解释,但是日本和中国的例子证明还有另外一条通往“近代”经济的道路,这条道路也是以高效率的制度和高水平的人力资本形成为特征的。在西欧自下而上的过程和制度起到了主要作用。而在日本和中国,近代制度的出现是国家从直接对经济的干预中退出并决定让市场发挥主导作用而得来的。

作者在本书中还提出了一个饶有兴味的观点,即中世纪欧洲的部分制度传统包括了关于国家和公民之间关系的新概念。这个公民权的概念也构成了重新解释民主国家和其公民之间的关系的基礎。这个进程开始于17世纪中期的英国,并且构成了1776年后的“大西洋革命”(Atlantic Revolution)的基础。建立于中世纪的民主传统在西欧新的议会制度进一步发展过程中仍然起着重要的作用。

<sup>①</sup> 他用书籍产量和消费量、有读写能力的人口增长以及技能溢价等指标来衡量这一过程。

1500年以后,欧洲大部分地区没有能保持住经济活力,特别是南部(意大利和西班牙)和中部(德国),在中世纪本来是很有活力,但是在近代早期出现了明显的衰退。简言之,在900—1300年间的几个世纪中,增长的过程出现在欧洲大部分地区,但是1500年之后,增长则被限制在北海地区。一个重要原因是只有北海地区保持、继承和发展了中世纪的民主传统。

为什么民主的制度相对有效呢?本书作者的答案是:这些制度使得保护没有权力的人的财产权成为可能。另外一个因素就是民主的程序,不论是在合作的团体(例如行会和公社),还是在以公民权为基础的国家中,民主程序都提供了一种透明的方式以改变“博弈规则”。经济学家和经济史学家经常关注于如何发展高效的制度,但是关键的问题之一是怎样发展有效的路径去改变不理想的博弈规则。经济发展意味着制度必须适应变化的环境。与此同时,制度总是有利于某一特定的社会群体,而这可能不利于其他人;每一次博弈规则的变化都有失败者和胜利者。一个社会需要元规则(meta-rules)来改变制度,这些元规则必须透明,并且能让所有人都接受。民主的程序解决了这个问题:它们在原则上可以被所有人接受,可以在元规则的稳定性和既有规则的灵活性之间保持一定的平衡,这种平衡可能是最优的选择。这种情况正如丘吉尔的名言所言:“民主是最坏的政府形式——除了其他所有不断地被试验过的政府形式之外”。

从上述简单介绍,读者即可看到本书的大致内容和贡献。当然,要深入和全面地了解作者的观点和方法,唯一的办法是认真阅读此书。和许多过于注重细节研究的经济史著作不同,本书内容丰富,气魄宏大,文字简明扼要,把丰富的内容包纳到有限的篇幅中。因此,读者在阅读此书时,将会我一样,在获得丰富的知识的同时,也得到很大的乐趣。林语堂曾说:“当我们把一个不读书者和一个读书者的生活上的差异比较一下,这一点便很容易明白。那个没有养成读书习惯的人,以时间和空间而言,是受着他眼前的世界所禁锢的。他的生活是机械化的,刻板的;他只跟几个朋友和相识者接触谈话,他只看见他周遭所发生的事情。他在这个监狱里是逃不出去的。可是当他拿起一本书的时候,他立刻走进一个不同的世界;如果那是一本好书,他便立刻接触到世界上一个最健谈的人。这个谈话者引导他前进,带他到一个不同的国度或不同的时代,或者对他发泄一些私人的悔恨,或者跟他讨论一些他从来不知道的学问或生活问题”。<sup>①</sup>对于那些渴望了解今天我们生活的世界是从哪里来的这样一个重要问题的读者来说,阅读此书就是找到了一位很好的指引者。

此外,我还要提一提本书的译者隋福民博士。他是一位优秀的中年学者,经济学和历史学的修养都很好。他在此书的翻译中付出了大量的心血,不仅准确表达了原著的意思,而且译文也流畅易读,从而为读者在阅读本书中文版时提供了很大的方便。这对于广大中国读者更好地了解本书的精髓,相信将会起到非常重要的作用。

最后,对本书中文版的面世深表祝贺,也希望中国读者能够在对本书的各个方面进行深入了解的基础上,与本书作者展开对话(我相信他一定会非常高兴这样做),并由此更深入地进入国际经济史研究的主流。

(责任编辑:高超群)

<sup>①</sup> 林语堂:《读书的艺术》,转引自《博览群书》杂志社选编《读书的艺术—如何阅读和阅读什么》,北京:九州出版社2005年版,第318—324页。